

# 从功能论到历史功能论\*

## ——兼谈经验材料对理论的修订功能

张丽梅 胡鸿保

**【摘要】** 本文致力于探讨大瑶山在费孝通从功能论到“历史功能论”的理论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尝试在此基础上结合马凌诺斯基从文化论到“文化动态论”的转变,讨论经验材料对理论的修订功能。我们认为,20世纪50年代民族工作的实践和学者们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学术交流和砥砺,为“历史功能论”的破茧而出积聚了能量。胡起望、范宏贵所著《盘村瑶族》隐藏着老师费孝通理论转型的玄机,堪称建构“历史功能论”理论大厦的一块厚重基石。

**【关键词】** 功能论; 历史功能论; 费孝通; 大瑶山; 文化动态论

**【作者】** 张丽梅,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重庆,401120;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4X(2013)04-0050-007

### FROM FUNCTIONALISM TO HISTORICAL FUNCTIONALISM:

### Also on the Revising Function of Empirical Materials upon Theory

Zhang Limei , Hu Hongbao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role of the Dayaoshan Mountains in the process of Fei Xiaotong's transformation from functionalism to "historical functionalism", and then tries to discuss the revising function of empirical materials upon theory with the study of Malinowski's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culture to cultural change. To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the practice of ethnic work in 1950s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of scholars in Central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contributed much to "historical functionalism". The book *The Yao in Pan Village* co-written by Hu Qiwang and Fan Honggui reveals the secret of Fei Xiaotong's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the building of "historical functionalism".

**Key Words:** functionalism, historical functionalism, Fei Xiaotong, the Dayaoshan Mountains, 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

作为“中国功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费孝通在传承马凌诺斯基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一直有立足于中国社会进行灵活运用、改造和创新的一面,为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国化建立了卓越功勋。乔健认为,晚年费孝通的理论已经超越了马凌诺斯基的功能论,而建立了其独特的“历史功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及其历史际遇”(11YJC850034)。

能论”。<sup>[1]</sup>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历史功能论”及其重要性,并将它视为建构人类学、民族学之中国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的重要依据和资源。<sup>[2]340-341</sup>本文致力于探讨大瑶山在费孝通从功能论到历史功能论的理论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马凌诺斯基从文化论到文化动态论的转变,讨论经验材料对理论的修订功能。

### 一、理论创新:从功能论到历史功能论

作为马凌诺斯基的入室弟子,费孝通深受马氏功能论的影响。费孝通念过两年医学预科,以生理学为基础的医学与极强调生理因素的马氏功能论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而其硕士生史禄国教给他的东西,尤其是对生物基础的重视(体质人类学训练)、对社会结构之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强调,与马氏的观点也十分吻合;此外,按费先生的说法,他在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基本上就是瑶族社区的功能分析<sup>[3]393</sup>。这一切使得费孝通很容易接受并认同马氏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并以此为指导进行调研和写作。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以“功能论”、“需要论”、“整体论”、“实证论”、“微型社区研究论”等作为基本的指导原则,试图忠实地继承和贯彻实施他所理解的马氏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sup>[4]</sup>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以及人类学研究跨越“文野之别”的积极探索,该书被马氏盛赞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sup>[5]13-19</sup>利奇尽管对以人类学家自身所在社会为对象的研究路径深表怀疑,并曾在多篇文章中对“中国功能学派”的一些英文代表作提出了较尖锐的批评,但他依然对该书不吝赞美之词,认为它极具功能主义特征,在民族志描述和解释上都恪守功能主义的原则和标准:

费著的优点在于其功能主义风格。和社会人类学家所写的所有佳作一样,它主要对一个小规模社区的关系网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会,或者说不应该,刻意声称具有某种“代表性”。它们不是某种更具一般性的东西的例证。它们的价值在于其本身的趣味性。但此类专著中的佼佼者,虽然只关注人类活动的某个微小范围,但它所能提供的关于人类一般社会行为的信息却比一整架《文化人类学导论》之类的通论性著作还要多。<sup>[6]126-127</sup>

然而,作为一部典型的功能主义民族志,《江村经济》同样反映了马氏功能论反对在人类学研究中混入历史的观点,不太重视历史维度的考察。这方面的不足,在有着悠久历史和海量文献的田野情境下,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不少学者都对此提出了批评:

费孝通理论概括的缺点产生于他致力于实地调查而轻视图书馆工作,他不使用像地方志等历史材料,他不重视30年代大量有关农村的文学作品,只是偶尔提到陈翰笙的文章。<sup>[7]69</sup>

费孝通认为,他对农村的了解,加上他对中国整体社会的深刻洞察,使其在获悉中国社会奥秘方面具有优势。在我看来,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他缺乏足够的中国历史知识以及对更广泛的制度框架的充分了解。<sup>[8]</sup>

其中,弗里德曼的质疑不仅仅是针对费孝通的。在他看来,“文献齐备”对于复杂社会的田野研究至关重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人类学家必须学会“利用文献”,“过去的事实应该纳入田野研究的分析视野,且不仅仅是作为‘现在的背景’,而是作为‘研究内容的组成部分’”。<sup>[9]xxiii</sup>换言之,以中国为田野的研究者必须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注意借鉴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但弗里德曼很遗憾地发现,中国当时的汉人社区研究大多“不那么具有历史学色彩”,产出的作品也因此“有所欠缺”。<sup>[10]</sup>

当然,因为中国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原因,对于弗里德曼的批评,费孝通并不能第一时间获知并予以回应或反思。但在几经人生起落、研究工作内容和思路转换之后,费孝通晚年在“历史”维度上多有关注、省思和创新。费孝通强调,“文化具有历史性,它是跨越时间、空间和生命的东西

……我们看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只有在历史中，文化才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绝不能抛开历史”。<sup>[11]</sup>他遗憾自己小时候没有受过“旧学”培养，晚年倡导、践行“补课”时也注意补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并强调“应多读点历史”。<sup>[12]</sup>同时，他在文章中多次坦陈自己早年的研究在历史维度上的不足之处：

马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现代问题……到我这一代人的时候，这个圈子里更是出现了人类社会学的研究不要混在历史里边的提法。我受了这种提法的影响，有一段时期跟了潮流走，也不很重视历史了。<sup>[12]</sup>

以《江村经济》来说我在关于历史材料方面应用得确实很少，而且很简单……总括一句我在这本书里并没有如马老师所说的结合了历史来进行的……<sup>[13]</sup>

在此基础上，费先生对“活历史”和“三维一刻”等概念进行了诠释，并认为人类学家应该而且可以透过田野工作来捕捉历史与功能在现实生活中的互动：

人回想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再用当前的话来表达，而且又是向一个外来人传达有关土人自己过去的事情。这里三维直线的时间序列（昔、今、后）融成了多维的一刻……严格地说，他〔马氏〕所听到的土人对他们昔时的叙述，只能看作是昔时在今时的投影，而且受到叙述者对后时的期待的影响……怎样处理多维一刻的时间交融的格局，确是研究人文世界的一个难度较大的焦点问题。<sup>[14]</sup>

我认为今后在微型社区里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应当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和历史学者合作，使社区研究，不论是研究哪层次的社区都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sup>[13]</sup>

乔健认为，“活历史”或“三维一刻”的概念是费先生对功能学派的一项创造性的贡献，这个概念不但肯定了历史在功能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更能进而提供功能学派为什么反历史的合理解释；晚年费孝通的理论已经超越了马凌诺斯基的功能论，而建立了其独特的“历史功能论”。具体来说，在西方功能论的观念中，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平面性的，而费孝通通过加入历史的因素将它转换为垂直的，同时融入中国文化的洗礼，功能论在包容度和诠释力方面同时得到了增厚与加强，成为“历史功能论”。<sup>[1]</sup>

## 二、大瑶山：理论创新的摇篮

费孝通接受吴文藻老师指导、开展功能论式的社区研究，经过数十年历练，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实践以后，充分地、深入地地了解国情，汲取传统史学的养分，从一个功能论者转变成为所谓“历史功能论”派的开创者，并且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笔者以为，在此过程中，大瑶山具有独到的象征意义，堪称其理论创新的摇篮。

大瑶山是费孝通、王同惠夫妇初出茅庐第一站，《花篮瑶社会组织》是费孝通整理王同惠遗著而成的第一本人类学专著。<sup>[15]</sup>吴文藻先生曾为该书亲撰“导言”，详细阐述了社区研究的含义、方法和作用。他认为该书是用“功能法”实地考察一个非汉族团文化之某一方面的重要成果，为当时的中国学界“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sup>[16]</sup>在该书的最后一章“族团及族团间的关系”中，费孝通谈到了老师史禄国的ethno理论，以及他们在大瑶山观察到的瑶族多个支系和彼此之间的边界、迁徙，外界的压力和认同等问题。后来费先生创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其实可以追溯到此时他们夫妇对于“多元一体瑶族”的实地感受。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该书仅仅只是对当时花篮瑶社会组织的横断面考察报告，体现了功能论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路径，但并不关注历史变迁，对历史文献的使用也很少。这一点，吴文藻先生在序言中虽然没有求全责备，但他还是以“附带声明”的形式指出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应该关注历史变迁、利用历史文献：

根据实地观察的社会学研究法与根据文献档案的历史研究法，二者是相成的。有重大的科学价值的社会学研究，必须是一个时间上的研究。因为可由观察得到的一切社会现象，总是历史上演变而来的结果。例如我们研究眼前中国某一区内的亲族制度，我们绝不能忽略了这制度在过去数千年来发展的大势，也不能漠视这制度在该社区内有关历史地理背景的题材。又如欲实地考察民风礼俗之时，我们必须参考一切有关礼仪习俗的历史文件，以资比较。所以我们认为历史的与功能的两种研究，应该相辅相成。<sup>[16]</sup>

花篮瑶研究之后，费孝通留学英伦，进一步深研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这一方面使得费孝通原本初具雏形的功能论观点更加系统、成熟，另一方面也使其愈加拒斥依赖历史方法和历史文献所进行的社会人类学研究。1936—1938年间，费孝通曾专门撰文批评用历史文献研究中国亲属制度的做法，冯汉骞的《中国亲属制度》亦在批评之列。<sup>[17]</sup><sup>267</sup>1938—1949年间，从作为博士论文的江村研究，到云南三村研究，到《生育制度》，到《乡土中国》，费孝通在田野调查和功能理论的结合方面更加娴熟，对功能理论本身的认识也越来越注意集马氏需要功能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结构—功能论之所长，在研究实践中不仅逐步形成了“类型比较”的认识路径，还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归纳。然而，在社会研究的历史维度方面，费孝通并未做出实质性改变。<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重新开始民族研究工作。1950年，费孝通担任中央访问团副团长、广西分团和贵州分团团长，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历时两年的调查访问。1952年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此期间，费孝通受到苏维埃学派的影响<sup>②</sup>，他与历史学家一起工作、相互交流，积累了许多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材料，开始注重历史及历史文献。费先生复出后曾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民族研究做过不少回顾和反思，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大约七年时间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使其认识了不少问题，“就我国少数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我得出一条认识：我们不能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去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否则就会偏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又看不清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前途。”<sup>[18]</sup><sup>1-18</sup>

学科重建以来，费先生在此前所积累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在社会研究的历史维度方面进行了更明确的总结和提炼，在学术思路上逐渐完成了从功能论到历史功能论的转型。对此，乔健曾有过专门论述<sup>[1]</sup>，笔者在此主要关注费先生指导学生所做盘村瑶族研究的过程及其成果，试图从中窥得费先生理论转型的玄机。

1935年费、王夫妇的瑶山调查因为突发意外并未完成，1978年费先生重访阔别43年的大瑶山，决定继续进行此前没有完成的调查。让学生胡起望、范宏贵去研究瑶族的另外一支——盘瑶，就是在原来花篮瑶研究基础上的拓展。我们可以把胡起望、范宏贵所著《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看成是费孝通和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的后续研究。

《盘村瑶族》是二位著者结合文献、对瑶族一个重要支系“过山瑶”进行村庄调查，从“山丁”地位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复杂的大瑶山社会的成果。全书计258页，约20万字。作者们在持续一年多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正史、方志、杂著、官书及当地瑶人借据、契约、谱牒、碑铭、经书、歌谣等相关记载，按照“从游耕到定居”、“从封闭到开放”这两条线索，为我们详述了盘村瑶族在经济生产、职业构成、婚姻家庭、服饰习俗、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使得盘瑶文化变迁的大体轮廓跃然纸上，为当时的民族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民族志范本。<sup>[19]</sup>

1981年，费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一次座谈会上谈到他是怎样具体指导胡起望等人从事盘村瑶族调查的<sup>[20]</sup>，1983年又为《盘村瑶族》写了一篇长序<sup>[21]</sup>，讲述了他的思路及在他指

① 王铭铭曾经披露了一桩轶事：费孝通在垂暮之年仍然表现出他对强调历史文献重要性的凌纯声等“南派”人类学家的轻视。参见王铭铭《民族学与社会学之战及其终结？——一位人类学家的札记与评论》，载《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

② 巴博德指出，费先生在1950年代早期成了“一个很不同的费孝通”，“热心地应用摩尔根的阶段论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参见巴博德，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载《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1页。

导之下两位作者是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也对今后的瑶族研究做了进一步的展望。在这两篇文章中,费先生除了继续倡导“微型研究”之外,还多次重申,对大瑶山的研究不能脱离历史来进行,必须关注社会变迁。“花篮瑶是王同惠在1935年调查过的,现在再调查一下看看有什么变化”,“少数民族从孤立到合作,从关闭到开放的过程”也值得研究,要在微型调查的基础上“综合五个集团的材料进行研究,看看他们是怎样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其中,费先生尤其强调关于瑶族形成之历史过程的研究将有助于达成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并着重提到了潘光旦先生关于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流动并形成特定趋势的设想,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线索。

不免费先生所望,《盘村瑶族》尽管也是基于村庄调查的微型研究,但它却如其副标题所示,并未就“村”论“村”、把“横断面”当作重点,而是更关注“历史”、“变迁”所具有的重要性,并非常注意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分析。<sup>①</sup>费先生在肯定《盘村瑶族》的同时,更是殷切期望胡、范二人能够开展进一步的后续研究。而且,从“费序”中的文字来看,他至少不是立意于让此类后续研究做成“孤岛式”、“无历史”的“标准民族志”,而是希望研究祖国大陆历史长河中的民族关系,村落研究被突破,发展到“以地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而“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可能是另一个地区的综合研究的开始。这个地区就是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

总之,“费序”中的话语让后来者反省,20世纪50年代民族工作的实践和学者们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学术交流和砥砺,为“历史功能论”的破茧而出积聚了能量。作为“学科重建”以来一系列所谓“追踪调查”的“头一炮”,学生胡起望、范宏贵所著《盘村瑶族》似乎隐藏着老师费孝通理论转型的玄机,堪称建构费氏“历史功能论”理论大厦的一块厚重基石。

### 三、讨论:经验材料对理论的修订功能

现代人类学是一门注重实地调查并强调从本地经验提炼普同理论的学科。马凌诺斯基遭遇特罗布里恩群岛,才有库拉理论;弗里德曼遭遇华南汉人社会,才有不同于非洲的世系群(宗族)范式。换言之,理论设想总是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相联系的,同时也得通过具体的经验环境来理解。黄宗智一直强调经验和理论连接,强调基于基本事实而非理论预期去寻找或提炼强有力的分析概念,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来推进自己的理论建构。他高度赞赏费孝通那种“建新鲜概念于踏实的经验研究,并付之于实践检验”的学术研究,认为费孝通的著作“能在深入的微观调查的基础之上提炼出跨时间的历史实践演变过程以及强有力的宏观概念,并在其后获得被实践检验的机会”。<sup>[22-23]</sup>那么,费先生基于经验资料的理论创新之具体路径是怎么样的呢?其他的暂且不论,仅以本文所关注的大瑶山研究以及费先生从功能论到历史功能论的转型而言,费先生正是以大瑶山的经验事实对“无历史”的功能论进行了“理论的修订”。

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的说法,我们在强调理论对经验的解释作用之余,还要注意经验之于理论的意义;除了被动地检验理论之外,经验研究对于理论还发挥着四种主动的作用:1)开创理论;2)修订理论;3)新的研究方法促使理论兴趣的重新聚焦;4)澄清理论概念。其中,“修订理论”是指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通常会发现一些新的事实,它们并非异乎寻常或未曾预期,也并非和现存理论不相容,只是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研究者一旦从中提取出一些新的重要变量,并且把这些变量和某个既有理论相结合,就会导致原有理论的扩展和改善。比如,马凌诺斯基发现,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用安全可靠的方法在内环礁湖里捕鱼时,巫术无须施行;但如果是在开放海域捕鱼,所用方法可靠性不高、风险较大时,巫术的仪式则非常兴盛。基于这样的经验事实,马凌诺斯基给有关巫术的早期理论注入了新的因素,特别关注巫术与诸如偶然、风险、不可控制性之类变量的关系。<sup>[24]190-208</sup>

<sup>①</sup> 有学者认为,《盘村瑶族》应该重点关注当时盘瑶社会的横断面。参见陈永强,谢剑《转变中的瑶人社会——兼评胡、范合著〈盘村瑶族〉》,载《贵州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

马凌诺斯基晚年短暂考察非洲，亲身体会了非洲社会急剧变迁的经验事实：

当飞机掠过尼罗人和班图人的边界，便可明显地看出我们正在进入的非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巴干达人的房屋是新建的，成方形，按欧洲样式建造；即使在天空中，也能见到土人们的服式和装饰品都带着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味道。道路和教堂、汽车和卡车宣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变动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并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与欧洲和非洲均有关联，但绝不仅仅是任何一方的复本。<sup>[25] 10</sup>

这促使他对基于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族志资料的功能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理论上流露出从功能转向过程的端倪，越来越注意文化接触与变迁问题，并在历史维度上有所反思：

这给现代人类学带来了新的任务，因为人类学以后必须关注文化变迁。……对文化变迁的研究必须考虑三种现实秩序：外来先进文化的影响；指导土著生活的传统文化要旨；两种文化的交互作用所导致的变化中的现象。只有对每个问题都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把非洲的影响、土著的反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都摆出来，我们才能达成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欧洲与非洲之间的文化碰撞绝不仅仅是两种初始影响的机械结合，而是会产生冲突、合作或者妥协。……我认为所谓功能主义并不也不能反对历史方法，反而是历史方法的必要补充。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功能方法首先感兴趣的是用文化过程来解释文化产品。这就引入了时间因素，虽然只是较小程度的，但确实具有历史意义。我本人曾倡导用传记方法研究亲属关系。在我对语言的研究中，我试图表明，对语言意义的研究应该开始于特定文化情境下对婴儿言谈的观察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和文化情境一样，时间情境之于功能方法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历史概念，另一方面，它们有助于对重构过程之一般规律的系统阐述。再次说明，我并不认为功能主义和历史重构是对立的。<sup>[25] 12, 26, 34</sup>

在此基础上，马凌诺斯基提出了分析文化接触和变迁的五项表格：A. 白人的影响、利益和意向；B. 文化接触与变迁的进展；C. 传统的遗留情况；D. 过去的重构；E. 非洲人自发性再整合与反应的新力量。<sup>[25] 75-76</sup>文化动态论初具雏形。可惜的是，马凌诺斯基英年早逝，没能在这一领域进行扎实的田野研究和完善的理论建构。<sup>①</sup>

在1937—1938学年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讨班中，费孝通接触并学习了马凌诺斯基关于文化动态的观点和方法，并与不少刚从非洲田野归来、关注非洲文化变迁的新一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学者有所交流<sup>[26]</sup>，在社会变迁问题上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思考。而大瑶山民族的多样性和汉文史籍方志的有关记录，则成为费孝通理论创新的社会生活源泉。费孝通遭遇大瑶山的经验事实<sup>[27]</sup>，经过20世纪50年代民族工作的实践，越来越注意到历史这一被传统功能论所忽视的变量，从而积极寻求对原有功能框架的修订和扩展，并发展出乔健所言的历史功能论。

#### 参考文献：

- [1] 乔健. 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
- [2] 杨圣敏.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1978—2008): 民族学卷[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3] 巴博德, 费孝通. 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 答问[G]//费孝通. 费孝通全集: 第十二卷.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 [4] 谢立中. 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 一种另类的功能主义[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2).
- [5] 马林诺斯基. 序[M]//费孝通. 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 戴可景,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 [6] Leach, E. R. *Social Anthropolog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7] 阿古什. 费孝通传[M]. 董天民, 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85.

① 马凌诺斯基关于文化动态论的思想主要见于其遗著《文化变迁的动力学》(费先生译为《文化动态论》), 但正如其学生 Lucy Mair 所言, 该书所表述的思想并不够成熟和完善, 如果马凌诺斯基看到的话, 一定会大加修改和增补的。参见 Firth, Raymond. *Man and Culture: An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Bronislaw Malinowski*.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57: 229-244. 格鲁克曼曾撰文对该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参见 Gluckman, Max. "Malinowski's 'Functional' Analysis of Social Change". *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Vol. 17, No. 2 (Apr., 1947), pp. 103-121.

- [8] Freedman, Maurice.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3(1).
- [9] Skinner, G. William. Introduction [G]//G. William Skinner.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0] Freedman, Maurice. Sociology in China: A Brief Survey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2(10).
- [11] 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
- [12] 费孝通. 暮年漫谈[J]. 群言, 2005(5).
- [13] 费孝通.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4).
- [14] 费孝通.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6).
- [15] 王同惠, 费孝通. 花篮瑶社会组织[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 [16] 吴文藻. 导言[M]//王同惠, 费孝通. 花篮瑶社会组织.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 [17] 费孝通. 《江村经济》附录一: 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G]//费孝通. 费孝通全集: 第二卷.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 [18] 费孝通. 《边区开发论著》前记[G]//潘乃谷, 马戎. 边区开发论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19] 胡起望, 范宏贵. 盘村瑶族[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 [20] 费孝通.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
- [21] 费孝通. 《盘村瑶族》序[M]//胡起望, 范宏贵. 盘村瑶族.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 [22] 黄宗智.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1).
- [23] 黄宗智. 连接经验与理论: 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J]. 开放时代, 2007(4).
- [24] 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 唐少杰, 齐心,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 [25] Malinowski, Bronislaw.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G. Cumberle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 [26] 费孝通. 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5).
- [27] 费孝通. 六上瑶山[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付广华)